

世界顶尖学府智慧文库

ZAI NIUJIN TING JIANGZUO

王启梁 主编

当代文化的危机

人们的自由问题

乌托邦之后

迈向 21 世纪的轴心

看不见的手与看得见的手

在牛津听讲座

——
精神的力量



UNIVERSITY OF OXFORD

中国民航出版社

精神的力量

王启梁 主编

在牛津听讲座



UNIVERSITY OF OXFORD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在牛津听讲座/王启梁主编. —北京: 中国民航出版社, 2002.4
ISBN 7-80110-469-2

I. 在…
II. 王…
III. 演说-世界-选集
IV. H01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19585 号

在牛津听讲座

王启梁 主编

出版	中国民航出版社
社址	北京市朝阳区光熙门北里甲 31 号楼 (100028)
发行	中国民航出版社 新华书店经销
电话	64290477
印刷	北京农大印刷厂
照排	中国民航出版社激光照排室
开本	850 × 1168 1/32
印张	9.75
字数	206 千字
版本	2002 年 5 月第 1 版 2002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7-80110-469-2/Z·053
定价	19.80 元

序
言

大学是知识的“工厂”和中心，“讲座”是知识的“浓缩”和精华。这也许是讲座丛书如雨后春笋、方兴未艾的合理因素。本书是世界名校系列讲座丛书的又一非凡力作。它集中精选了 800 多年来牛津校史上的经典讲座，内容涵盖自然社会、人文社科，所收文章系为名家大师、专家教授、知名学者、社会名流的精彩演讲。

文章深入浅出、简练朴素，既有引人深思的深厚学理，又有催人奋进的人生智慧。文章兼容并蓄，博大精深，可谓思想的精粹、智慧的集锦。



目 录

目 录

MU LU

国家的疆界·····	玛格丽特·撒切尔 (1)
关于大学的概念·····	约翰·亨利 (5)
当代文化的危机·····	特里·伊格尔顿 (9)
东方和西方 ·····	文森特·奥斯特罗姆 (26)
人生·邪恶·抗争 ·····	约瑟夫·布罗茨基 (44)
中国与欧洲传统中的重写方式 ·····	D·佛克马 (52)
人们的自由问题·····	贡斯当 (64)
民族主义的现在和未来 ·····	B·安德森 (87)
全球化：批判与分析 ·····	詹姆斯·彼得拉斯 (95)
乌托邦之后·····	莫里斯·迪克斯坦 (112)
迈向 21 世纪的轴心·····	艾森斯塔特 (127)
希腊文明的兴起·····	伯特兰·罗素 (155)
理论的旅行和全球化的力量 ·····	加布理尔·施瓦布 (181)





民主、管理与市场	约翰·迪·苏理文 (195)
文化帝国主义与它在第三	
世界的消费主义	莱斯理·斯克萊尔 (205)
中国经济改革的构想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 (223)
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	费尔南·布罗代尔 (239)
看不见的手与看得见的手	M·弗里德曼 (264)
权威集中与宪法创制	凯瑟琳·费明·塞勒斯 (271)
附录一：牛津大学校长柯林斯·卢卡斯在清华大学	
建校九十周年庆祝大会上的讲话	(296)
附录二：牛津大学	
	(299)

玛格丽特·撒切尔

玛格丽特·撒切尔：1925年10月13日出生于英格兰瑟姆镇一个经营杂货的小商人家庭，毕业于牛津大学，1979年当选为英国历史上首任女首相，作为“铁娘子”而闻名于世。她自强、自立的心路历程令无数人倾为之倾倒。这是她于1988年9月20日于布鲁日所作的一篇倾倒了无数政客的演说辞。

国家的疆界

欧洲不是《罗马条约》的产物。欧洲理念也不是任何团体或机构的财产。我们英国人也是欧洲文化遗产的继承者，就像任何其他欧洲国家一样。与欧洲其他地区、欧洲大陆的联系，是我国历史的主导因素。曾有300年，我国是罗马帝国的一部分，我国地图中仍能找到罗马人修建的笔直道路。我们的祖先——坎宁特人、撒克逊人和古斯堪的纳维亚人——来自欧洲大陆。

在诺尔曼和金雀王朝统治下，我们民族——用共同体爱





用的话说——“得到了改造”。

今年，我们纪念光荣革命 300 周年。在光荣革命中，英国王位传给了奥兰治的威廉和玛丽女王。

看一看英国伟大的教堂，读一读我们的文学，听一听我们的语言，这一切都能证明：我们从欧洲吸取了文化财富，其他欧洲人也从我国吸取了文化财富。

自 1245 年（大宪章）颁布以来，我们英国倡导和发展了代议制，作为自由的堡垒。对此，我们有理由自豪。在数百年中，英国曾是欧洲其他地区人民逃避专制、寻求庇护的处所。对此我们也感到自豪。

但是，我们知道，没有欧洲的政治思想遗本，我们不可能取得当时的成就。我们从古典思想和中世纪思想中借鉴了区别野蛮与文明社会的法治概念。长期以来，基督教世界是欧洲的同义词，基督教思想承认个人的独特性和神圣性。我们仍然据此信仰个人自由和其他各项人权。

欧洲历史往往被描述成一系列无休止的战争和争吵。但在我们看来，今天感受最深的，无疑是我们的共同经历。例如，欧洲人如何对大半个世界进行探索、殖民以及——是的，无须惭愧——使之开化的历程，是需要才能、技艺和勇气的非凡历程。

我们英国以特殊的方式对欧洲作出了贡献。几个世纪以来，我们为防止欧洲被一个大国主宰而战斗。我们为欧洲自由战斗和献身。在距此地仅几英里的比利时境内，埋葬着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阵亡的 12 万名英国士兵的遗体。如果没有这种战斗和献身意愿，欧洲早就统一了——但不会在自由的旗帜下，也不是在正义的旗帜下。英国在上次大战全过程





对抵抗运动的支持，有助于使许多国家的自由之火保持不灭，直到解放之日。

仅这一切，就能证明我们对欧洲未来的承诺。

欧洲共同体是欧洲特性的一种表现，但不是惟一表现。我们绝不能忘记，在铁幕以东，曾全面分享欧洲文化、自由和欧洲特性的人民，被切断了与根的联系。我们将永远把华沙、布拉格和布达佩斯看做伟大的欧洲城市。

我们也不应忘记，正是欧洲价值观，使美利坚合众国成为自由的坚定捍卫者。

这绝不是枯燥地叙述藏在积满灰尘的历史图书馆内鲜为人知的事实，而是记录了近 2000 年来我国参与欧洲、与欧洲合作并对欧洲作出贡献的历史。今天这种贡献与以往任何时候一样有效和有力。是的，我们也着眼于更广阔的视野——其他国家也一样——这一点要感谢上苍，因为欧洲如果是一个心胸狭隘、封闭自守的俱乐部，绝不会有今天的繁荣，也绝不会有将来的繁荣。

欧洲共同体属于全体成员。它必须反映全体成员的传统和理想。

我要清楚表明：英国并不梦想在欧洲共同体边缘过着一种舒适、与世隔绝的生活。我们的命运在欧洲，我们是共同体的一部分。这并不是说，我们的未来仅在欧洲。不过，法国或西班牙或者其他任何成员的前途，也并非仅在欧洲。

共同体本身不是目的，也不是一个根据某种抽象的学术概念定义不断加以改造的机构，也绝不能被无休止的规章所僵化。

欧洲共同体，是欧洲藉以确保人民未来繁荣和安全的实际手段，因为在世界上还有许多其他强大的国家和国家集团……



试图抑制国家，将权力集中在欧洲大集团的中央，会造成极大的破坏，并损害我们力争实现的目标。

欧洲之所以会强大，恰恰因为法国是法国，西班牙是西班牙，英国是英国，各有自己的习俗、传统和特性。企图削足适履，将它们嵌入某种欧洲模子，是愚蠢的。

共同体的一些创始者曾认为，美利坚合众国可以是共同体的模式。

但是，整个美国历史与欧洲历史截然不同。人们去那里，是为了摆脱欧洲的不容忍和对生活的种种限制。他们寻求的是自由和机会。两个世纪以来，坚定不移的目的感，创造了作为美国人的新团结和自豪——正如我们的自豪在于我们是英国人或比利时人或荷兰人或德国人。

在许多重大问题上，欧洲国家应力求以统一的声音说话，我是第一个这样说的。我希望，我们在合起来比单独做得更好的事情上，更加密切地合作。这样，不论在贸易、防务或与世界其他地区的关系上，欧洲会更强大。

但是，更为密切的合作，并不需要将权力集中到布鲁塞尔，或由指定的官僚机构来做出决定。

苏联等试图由中央统治一切的国家，正在意识到，成功取决于从中央分散权力和决策。而恰恰在这个时候，共同体中的一些人，似乎想反其道而行之，的确令人啼笑皆非。

我们成功地在英国收缩国家疆界，并不是为了在欧洲重新推行国家疆界，让一个欧洲超级国家在布鲁塞尔实行新的控制。

我们当然希望欧洲更加团结，更具有共同的目的感。但同时，必须保持不同的传统、议会权力和对自己国家的民族自豪感——因为这些一直是数百年来欧洲活力的源泉。（掌声）



约翰·亨利

约翰·亨利（1801—1890年），英国宗教领袖、教育家。在牛津大学受过良好的教育。1846年成为红衣主教。1854年，约翰·亨利就任都柏林新成立的天主教大学校长。《关于大学的概念》是他为准备该校成立而发表的一系列演说中的组成部分。原文分为两部分，现合为一篇。这篇演讲阐述了作者关于大学的看法和理想中的大学模式，也表明了自己对有效率的学习方法的看法，鼓励人们发挥积极性、能动性，文风严谨而平易。

关于大学的概念

各位先生，我向你们声明，如果有两种大学，一种是所谓的大学，它不提供住宿，不督察学习，对修满许多课程考试及格的任何人都授予学位。还有一种大学则既无教授亦无考试，只是把一定人数的年轻人召集在一起过三四年，之后把他们送出学校，像人们所说牛津大学近60年来所做的那样。如果要我在这两种大学中选择，问我这两种方法中哪一种更有利于知识的训练——我并不从道德的角度说哪一种更



好，因为显而易见，强制性的学习必定好，而懒散则极有害——如果我必须断定这两条道路中哪一条在训练、塑造、启发人的头脑方面更为成功，哪种方法培养出来的人更适合现实的任务，训练出更好的公职人员，产生出通晓世情的人和名传后世的人，我将毫不犹豫地选择那无教授亦不考试的学校，它优于那种强求学生熟悉天底下每一门科学的学校。……

当一大群年轻人，具有青年所有的敏锐、心胸开阔、富于同情心、善于观察等等特点，来到一起，自由密切交往时，即使没有人教育他们，他们也必定能互相学习；所有人的谈话，对每个人来说就是一系列的讲课，他们自己逐日学得新概念和观点、簇新的思想以及判断事物与决定行动的各种不同原则。婴儿需要学会理解由他的感觉传递给他的信息，这就是他本分要做的事。他以为看见的一切事物都近在身旁，后来才了解到情况不尽如此。这样，他就从实践中得知他最早学到的那些基本知识的关系和用处，这是他生存必需的知识。我们在社会上的生存也需要有类似的教育，这种教育由一所大的学校或学院提供。它的作用在本身领域中可以公平地称之为开扩心胸。……姑勿论它的标准与原则为何，是真是假，这是一种真正的教育。至少它有培养才智的意图，承认学习知识并不仅仅是被动地接受那些零星、繁琐的细节。一批最卖力气的教师在没有相互的同情与了解，没有思想交流的情况下，绝不可能作出这样的成绩。一批没有意见敢于发表、没有共同原则，只是教导提问的主考官也同样达不到上述目的。那些被教被问的青年不认识主考官，他们彼此也不相识，他们的主考官只在冷冰冰的教室里或在盛大的周年纪念日向他们教授或询问一大堆种类不同、相互



间并无哲理联系的题目，每星期三次或一年三次或三年一次。……

受到初步的基础教育之后，对于愿意独立思考的人来说，在图书馆里随意涉猎，顺手取下一本书来，兴之所至，深入钻研，这该有多大的好处啊！在田野中徜徉，和被放逐的王子一同欣赏“树木的说话和溪中流水的大好文章”！这该是多么健康有益啊！

首先，最明显不过的是，这些例子，还可以有更多的例子足以说明知识的交流，必然是扩增知识、启发思想的条件，或从那个意义上说是造成这种条件的手段。关于扩增知识与启发思想近年来在某些地方谈论很多，这是不容否认的事实。但另一方面，同样明显的是，知识的交流并不是扩增知识、启发思想的全部过程。扩增知识所包含的意思，不仅是被动地将一堆原来不知道的都接纳到脑子里，而是对涌来的新观念作积极有力的脑部活动。这是一种具有创造性的行动，将我们取得的知识素材转化为有条理和有意义的；这是使我们的知识客体成为我们自己的主体事物，通俗地说，就是将我们接收的事物加以消化，使之与我们原先的思想融为一体，没有这些，就不会随之产生所谓知识扩增。各种观念来到脑里时，如果不把一种观念与另一种观念比较并为之建立系统，就没有知识扩增可言，我们不仅学习，而且将不断与已知的进行对照，只有这样，我们才会感到心智在生长、在扩展。所谓启蒙，不仅是增加一点知识，而是将我们已经学到的和正在学习的大量知识吸收积聚起来，在我们的思考中不断运转前进。因此，真正伟大并为人类普遍承认的才智之士，像亚里士多德、圣托马斯、牛顿或歌德（我说到这类



才智之士时，有意同时举出天主教教会内外的例子），能够将新与旧、过去与现在、远与近联系起来看，因而能洞察这些事物之间的相互影响。没有这种观点，就看不到整体，看不到本质和中心。用这种观点掌握的知识就不仅可以看到一件件事，而且可以看到它们之间的本质联系。因此这样的知识便不仅是学得某样事物，而且是一种哲理。

由此类推，如果摒弃了这种分析、分类、彼此协调的过程，即使再加上多少知识，人的心智也谈不上扩展，也不能算是得到了启发或具有了综合的理解能力。举例来说，我曾指出记忆力极好的人并不就是一个哲学家，正如一本字典不能称为语法书一样。有些人脑里有包罗万象的各种思想概念，但对这些思想概念之间的实际关系却一无所知。这些人可能是古玩收藏家，纂写编年史的人，或是动物标本炮制者，他们可能通晓法律，精通统计学，在各自的职位上都很有用。提到他们时，我不敢表示不敬。可是，即使有这些成就也不能保证思想不流于狭隘。如果他们只是一些博览群书的人，或是见闻甚广的人，那么他们还配不上“造诣高深”的美称，也不能算得受到了开明的教育。

同样，我们有时会碰到一些见过大世面的人或是曾在他们的时代有显赫成就的人，但是这些人不会概括归纳，也不懂得如何观察。他们掌握有关人和事详尽的、新奇的引人入胜的资料。同时，由于受到不十分清楚确定的宗教、政治原则影响，他们涉及一切的人和事，完全是一些就事论事的现象，引不出结论。他们对这些事物没有分析、讨论，说不出什么道理，对听者并无教益，只是单纯地说话而已，尽管这些人见闻很广，但没有人会说他们具有渊博的学识或精通哲理。（掌声）



特里·伊格尔顿

特里·伊格尔顿（1943—）英国牛津大学著名思想家与批评家，主要著作有《从文化到革命》、《权力神话》、《批评的意识形态》、《后现代主义幻觉》等。《当代文化的危机》是他于2001年4月6日在牛津大学圣凯瑟琳学院所作的具有很大影响的精辟讲座。

当代文化的危机

女士们、先生们：

这座现代学院就叫做圣凯瑟琳学院。牛津大学的许多学院不可能都跟着咖啡店的名字起校名，不过，我待过的那个沃德姆（Wadham）学院，听上去却有点百货店的味道。这个名字包含着理论思考的丰富材料，可以思考问答式教学方法；思考被压迫者的模仿时髦和自我掩饰；思考马克思在《雾月十八日》中提到的戏仿现象；思考这里一无所有的男人们占有了一个女人的名字，那是一个殉道者的名字；还可以思考尼采的谱系学思想，把犯罪、失误、疏忽以及微小的机遇纠合成那些不动脑筋的人所称的传统。我笼统点一下这



些话题，想尽快把它们打发掉，因为我不想把这次演讲花在我新来乍到的这个学院的名字问题上。我只想说，当我也模仿新潮、思考自己的谱系归属时，我无法回避那种十二分强烈的感觉，我经常在凌晨时分感觉到自己是因错就错地成了沃顿英文教授。但是，当教授总比失业好，所以我无意于对这份厚礼吹毛求疵。（笑声）

其实，我根本不想对批评理论多说什么。杰弗里·埃尔顿把批评理论称为知识分子的闲话，我发现自己也越来越不能忍受在读者和文本之间横卧着一种不成体统的话语。你们也许已经注意到，有些术语如象征、扬格、有机统一，以及美妙的质感等，把文学作品拉得离我们更近一些，而性别、能指、亚文本以及意识形态等术语却将作品远远地推开。总的来说，要谈宇宙景观，不要谈殖民主义，要谈美，不要谈资产阶级，这样做才有所裨益。我们可以谈论重压之下的人类状况，但是不要提到任何具体集团的人们受压迫的问题，否则文学就会误入社会的歧途。平常的语言就有“丰富的形象性”，从巴厘岛到纽约布朗克斯区，人人都听得懂。“烈性的阳刚之气”只不过是那些与C·S·刘易斯和E·M·W·提亚德不在一条道上的人们的粗野行话而已，那些人硬要把他们烦人的意识形态见解引入本来是美学的问题。但是我不准备多谈理论，因为理论怎么看也像一座大冰山的端点、大工程里的一部分，总是要取消意义，摧毁标准，用《贝诺纪年》(Beano Annual)取代《贝奥沃夫》(Beowulf)，编撰一本只包括泰恩赛德民谣和岩洞图画的教学纲要。换句话说，问题的关键是西方文化本身弥漫着危机。虽然并非所有地方都可以明显看到这种时代的风云剧变，尤其在牛津的考试里看不

到这种情况，但是我们应该用瓦尔特·本雅明的那句名言给自己提个醒，“一切照样进行”正是危机所在。

这一剧变的性质如何呢？随之而来的无疑还有民族性的危机，凝聚一个民族的除了文化还能是什么呢？不会是地理，这是可以肯定的：不管你在百慕大还是在直布罗陀海峡，你仍然可以是英国人。也不会是政治的国家：因为那种苍白贫血的统一性只能从阶级合作的生活形式体验中长出肉来。但是那种阶级合作的民族属性现在却因为一系列的因素而成了问题：出现了跨国资本主义，它像荒原那样随随便便地横穿民族国家之间的疆界；地缘政治在转型，发达国家正在把它们对着东方的枪口摆向南方；革命的民族主义冲击着宗主国中心；一种地地道道的世界性的文化以后现代主义的面目出现了；在种族主义根深蒂固的社会里，出现了种族的杂多性。除了这些因素，像我这类厚着脸皮、不识时务的马克思主义者还高兴地从理论的角度看到，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表现为移民劳动和资本主义的全球一体化逻辑与传统主义、地方主义以及后帝国主义民族文化的精神律令颇多抵触。

凡此种种，无不与英国文学研究有关。亚瑟·奎勒·卡奇深知这一点，1916年他在剑桥大学讲过这样的话：“在座的人年龄还小，没有几个会记得弗里曼的《诺曼人的征服》（Norman Conquest）或格林的《英国人民简史》（Short History of the English People）对年轻人的心灵所产生的震撼。在上一世纪的70年代早期或80年代晚期，这些著作好像拨开了云雾，让我们从文学上以至政治上看到了自己的先辈，他们得到了应有的光辉地位。”英国文学研究从一开始就专